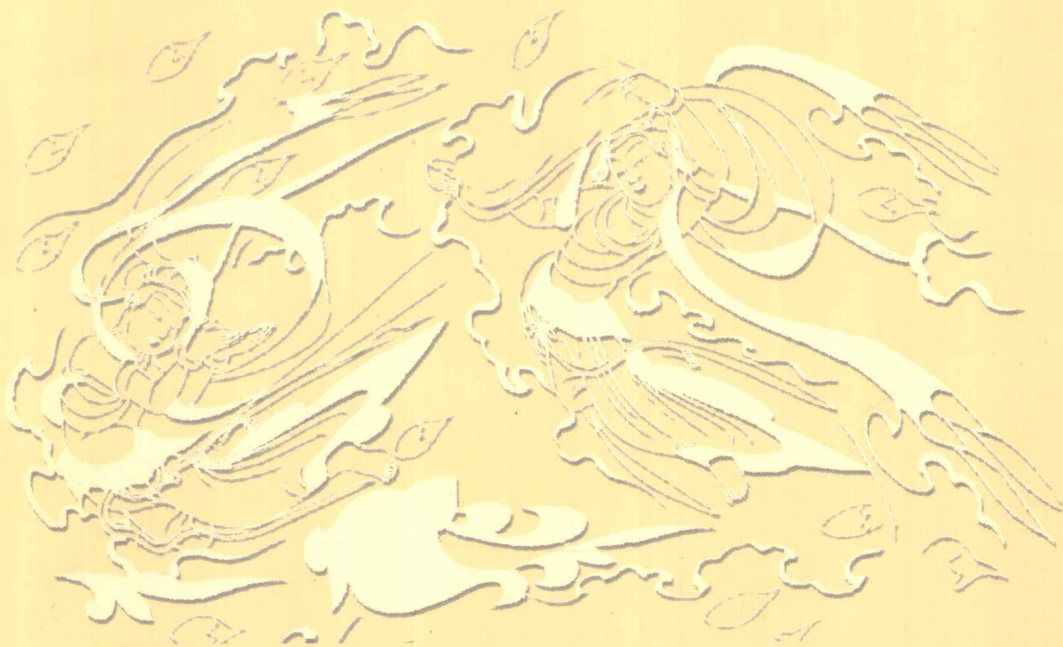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

——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编委会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文集 /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 - 226 - 02458 - 6

I. 敦... II. ①段... ②茂... III. ①敦煌学—研究—文集②中国—通史—研究—文集 IV. ① K870.6 - 53
② 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306 号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

——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

段文杰 茂木雅博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28 字数 788 千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 - 226 - 02458 - 6/K · 423 定价:100.00 元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编委会

主 编

段文杰 茂木雅博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德 邓文宽 孙晓岗 齐陈骏 李正宇 池田温
杨曾文 杨富学(执行) 张国刚 陈国灿 郑炳林
茂木雅博 周伟洲 段文杰 颜廷亮 霍旭初

序

段文杰

时间真如白驹过隙，倏忽之间，我的老同事孙修身同志已去世近一年了。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学术业绩，并激励后人，孙先生的子女、同事、朋友及其他学界同仁共同筹划在先生去世周年之际，出版纪念孙先生学术成就的论文集。现已征得论文 60 余篇，洋洋大观。其中论文大多与敦煌学有关，其它与古代佛教、丝路史地、北方民族有关者也为数不少，正与孙先生的学术领域相契合。其作者既有孙先生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许多得益于孙先生的后学，更有孙先生子女的新作，珠玑毕备，琳琅满目。在文集即将付梓之时，编委会命我作序。我与孙先生共事多年，交情非浅，对先生的学识、为人颇多了解。抚今追昔，不禁潸然泪下。孙修身同志为河南荥阳人。1955 年 8 月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四业结束后，于 1959 年 8 月分配至西北民族学院政教系任教，1962 年调临泽县水利局工作，1963 年调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工作至今，曾任研究所保护组组长。1982 年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8 年晋升副研究员，1993 年晋升研究员；近年来兼任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教授。一生主要从事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工作，献身敦煌事业 30 多年，与敦煌研究院同仁一道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文物的保护与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先生治学勤勉，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非常注重敦煌学资料的积累，为研究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知识面宽广，学识渊博，自 1979 年以来，先后在国内外书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并出版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由他撰写的《敦煌与丝绸之路交通研究》一书，不日也将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印行。他涉猎领域宽广，大凡历史、地理、考古、文献、民族、宗教、中外关系等诸多学科，都有建树，极富开拓精神，取得的学术成果也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首肯。

孙先生一生工作认真，正直耿介，生活简朴，晚年十分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为青年一代敦煌学者的成长花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去世是敦煌学的一大损失，更是敦煌研究院的一大损失。地不爱宝，天不赐年，使我再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悲哉！谨以此短序略表对故友孙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目 录

序	段文杰(1)
孙修身老师の学问は永远に不灭	[日]茂木雅博(1)
怀念孙修身先生	李明伟(3)
父亲的回忆	孙晓岗(5)
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简介	孙修身(7)
冈仓天心与华尔纳	[日]茂木雅博(11)
法门寺唐代地宫捧真身菩萨曼荼罗之研究	吴立民 韩金科(23)
“般遮瑞响”考	霍旭初(35)
敦煌《五台山图》中的道路交通简论	马 德(41)
论莫高窟中唐时期经变画的模仿性	胡同庆(47)
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述论	沙武田(56)
敦煌角抵考	李金梅 陈 炜 李重申(64)
龙门北市香行像窟考察	张丽明(71)
关于大足石刻文殊菩萨造像的考察	
——1995年9月陪同故友孙修身先生考察大足石刻记实之一	宋朗秋(77)
试析大足石刻宝顶石窟的造像结构	
——1995年9月陪同故友孙修身先生考察大足石刻记实之二	宋朗秋(79)
契丹族的雕塑艺术	黄凤岐(81)
谈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经幢	温玉成(87)
圣容寺与“凉州山开瑞像现”	张宝玺(95)
克孜尔石窟考察与研究世纪回眸	赵 莉(97)
黑水城遗址出土12世纪“恒星巫术圈”	[俄]萨摩斯卡·吉拉著,郑国穆译(107)
敦煌藏经洞:古代学术的海洋	
——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暨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	李正宇(110)
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两件唐户籍残片	陈国灿(113)
敦煌遗书鉴别三题	方广锜(118)
北京图书馆藏《吴和尚经论目录》有关问题研究	郑炳林(125)
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具注历日》“杂占”补录	邓文宽(135)
读敦煌缘起类作品及其他	张锡厚(146)
敦煌文学杂考三则	张鸿勳(155)
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拟)残卷研究	黄 征(163)
关于 S.078V 和 S.1725V 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	吴丽娱(168)
简述悬泉置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张俊民(179)
近年来日本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	[日]池田温著,王宇 房学惠编译(186)

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权的集中与分散·····	杨际平(192)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	程喜霖(201)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	李并成(218)
丧祭与斋忌·····	谭焯雪(225)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平章”一词·····	杨 森(230)
唐西州政府机构的检点制度与值班制度·····	李 方(234)
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245)
玄照法师求法印度经行路线考·····	孙晓岗(253)
王玄策的印度之使及其意义·····	孙晓丽(258)
迭烈逊考·····	刘再聪(262)
孔子和亚里斯多德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祁建平(270)
再论“昆仑奴”与“僧祇奴”·····	周伟洲(275)
从文化生成的原生态角度考察青藏高原与中华内陆的历史文化联系·····	张碧波(280)
契丹辽朝与“世界”的经济文化往来·····	仁爱君(295)
耶律乙辛重评·····	孟凡云(306)
略论西夏党项民族文化·····	韩小忙(313)
Sarıx Ujgur 考源	
——兼论龟兹回鹘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李树辉(318)
Two Identical Features in the Hexi Dialect ·····	Kahar Barat(333)
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 ·····	Yang Fuxue(343)
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 ·····	[日]高田时雄著,马茜译(348)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顓及其著述·····	杨曾文(355)
“东山法门”和唐初文人佛教·····	孙昌武(363)
《阿含经》中的弥勒佛·····	黄夏年(367)
《地府十王拔度仪》及其有关问题·····	杜斗城(381)
试论成都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孙晓岗(387)
药山惟俨的宗系和禅风·····	徐文明(406)
从敦煌文献看道信禅法·····	杨富学 王书庆(413)
敦煌文化中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	颜廷亮(418)
20世纪敦煌汉文摩尼教写本研究述评 ·····	林悟殊(430)
孙修身先生年表(附孙修身先生著作目录)·····	(436)
后记·····	(440)

孫修身老師の學問は永遠不に滅

茂木雅博

日本 茨城大學人文學部

孫修身老師は1935年6月河南省滎陽ごお生まれになり、1959年西北大學歴史系考古學專攻をご卒業になられた。卒業と同時に蘭州の西北民族學院の教官に任命れさ、その後1962年には甘肅省臨澤縣水利局に一次轉任したが、1963年から2000年1月に急逝されるまでの40年近い年月を敦煌で研究に従事され多くの業績を残された。孫老師の學問お大變幅く、歴史學・地理學・考古學・文献史學・民族學・宗教學・美術史・國際關係論等に及び、その豊かな先見性と比較研究の視點を加味した研究法による成果日本で高評されている。

孫老師の學問の基礎は敦煌における確基礎調査であり、中國の多くの關連遺迹を嚴格なまでに實地調査されている事である。そてには老師の學問に對する人間性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る。先生の業績を整理すると、早くは敦煌教藝術中の教東傳史迹畫に注目ちね多くの論文を發表されている。特に劉薩訶史迹畫の研究は教美術界に大きな影響を與えている。てうした業績た先生の名著「王玄策事迹鈎沉」や「敦煌與絲綢之路交通研究」にまとめらねこいる。

第二の研究領域は教美術の中の經變畫の研究である。特に「法華經・觀音普門品」に關する研究成果はその着眼といい、學識のさといい他の追従を許さないものがある。

第三は教教典中の「說報父母恩重經」に關する研究である。老師は敦煌藏經洞の寫本を基礎として、他の版本、金石文、各石窟等の「說報父母恩重經變畫」から教の中國化の源流及び浸透化への研究である。

第四は瓜州曹氏歸義軍政權の研究である。老師はてるの研究には特に重點を置きこ研究している。そして多くの研究成果を公にされている。私の知る範圍で年代順に整理すると、1980「瓜州曹氏年表補正」(賀世哲氏共著)「甘肅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82「瓜州曹氏與敦煌莫高窟」(賀世哲氏共著)「敦煌研究文集」。

1982「張淮深之死再議」「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

1983「談與瓜州曹氏世譜有關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第5期。

1989「五代時期甘州回鶻與中原的交通史」「敦煌研究」第3期。

1990「五代時期甘州回鶻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第3期。以上の通りごある。で子息曉崗氏によると老師は生前にての研究成果を1本にまとある準備に入ろうとしていたという。

第5は后進に對する指導である。特に晩年は母校の西北大學や蘭州大學の教授を兼任されており、敦煌研究院の若手研究者に對しても大變熱心に指導されていた。老師は1993年東京藝術大學に交換教授として訪日された事がある。私はの時老師に茨城大學の學生にご講演をお願いした、すると老師は東京から遠路水戸までご足勞下さり、2時間にわたつてお話をされ、その後學生たちと大變

親しく和やかにお酒を酌み交わして下さった。老師が後進を國境がなく指導されているお姿が私には今も脳裏に焼きついている。

私に老師を紹介して下さったのは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元所長の鞏啓明先生であつた。それは1993年3月であるから老師とのおつき合いは僅か7年である。その間研究者として多くの事を學ばせて頂いた。特に現地調査の重要性、莫高窟の圖像資料の値、考古學資料、文獻資料の利用及び總合的研究の方法等々は言うに及ばず、老師の學問的な姿勢が私にさつて大きな刺激であつた。老師は趣味を持たず、出世を好まず、生活は質素で、勤勉直に真面目な研究た没頭されるタイプであつた。私はその裏に奥様の絶大な協力と家族の理解があつてこそ、孫老の學問が生まれたものと確信している。私は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に参加して、世界各國から300名を越す研究者が集まり大盛況であつた影に孫老の存在が極ぬて大きかつた事を思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つた。

本書は正に孫老の學問の幅のさと、深さを示す交游の賜物の何者でもない。私は孫老の日本の友人の一人とした本書の出版を心からお祝いして序としたい。。

2000年10月,日本國總州佐原の寓居にて

怀念孙修身先生

李明伟

北京石油学院社科部

2000年8月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姜伯勤先生含着热泪做了题为《在敦煌学习》的大会发言,回顾了他在敦煌学研究几十年的生涯中,敦煌研究院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他的真诚无私的帮助。听着他充满感情的发言,我的心情亦是同样激动,甚至涌起难以遏制的阵阵悲伤:因为我刚刚才得知孙修身先生不久前突然病逝了,我手中拿着他的新作《王玄策事迹钩沉》,也不是如他生前所约亲手签名送我,而是刚刚由别人转交的。

孙修身先生是我在80年代初研究敦煌学时,最早结识的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之一。不过因为他的性格特别,格外引起我的注意,渐渐交往就密切起来了。他是一个脾气很倔的人,而且遇事特认真。经常为了学术问题和别人争执不休。当时在敦煌研究院有两个著述多产的人,一个是遗书所的李正宇先生,一个就是考古所的孙修身。尽管他俩都是河南老乡,但是遇到学术见解不同,自然顾不得老乡面子,就比别人争论得多,争论得激烈一些。这也是研究院的一段佳话。而现今认真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大理解他们要干嘛。但孙修身可就是这么一个真诚的心地。我记得1990年冬天我们在陕西师大一起参加《丝绸之路大辞典》编纂会,他告诉我,他正在搜集王玄策事迹,准备写一本书。他知道我一直在研究丝绸之路贸易史,这本书对我可能有用处,答应出版后一定首先送我。10年过去了,他依然记着自己答应的事。现在我手里摩挲着这本书,不禁潸然泪下。

他对后学的真诚帮助也是如此。1992年我写了一本书《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想请常书鸿先生作一篇序,但此时常老已经眼力不济,而且我也不知常老在北京的住址。孙修身先生这时正要到北京去,问了我的要求,便自告奋勇拿着书稿去找常老。孙先生后来告诉我,序言是由常老口授,常夫人李承仙先生协助,他自己记录的。常老年事已高,尽管手颤抖难捉笔,但仍亲笔署了名。我这才知道这篇序文得来是这样的不易。不久,常老就辞世了。1994年夏天在莫高窟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并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李承仙先生携常书鸿先生遗像和遗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来到莫高窟下寺当年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小院,设了灵堂祭奠常老,许多人都去致祭。孙修身先生特意带我去下寺吊唁常老并看望李承仙先生。当孙先生认真地向常夫人介绍我时,她只是哽咽着说:“记得你,记得你。”在鸣沙山前那个朴素、破旧并寂静得近乎荒凉的小院里,望着李承仙、孙修身先生辛劳疲惫的身影,我感觉深深触摸到敦煌的历史脉搏。而孙修身先生和敦煌研究院的许多孜孜不倦耕耘,把生命和青春默默献给莫高窟的学者,都是这脉搏的生命流芳。在孙修身先生作古以后,我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我调到南方工作以后,不能像过去一样方便地向他请教疑难问题了,只好打电话。那时我正在写《丝绸之路贸易史》,对于丝绸之路之西南夷道的永昌路这一段的情况,因为王玄策《中天竺国记》和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古籍都已失佚,间接引证的材料又不太敢相信,所以很烦躁。加上《丝绸之路

大辞典》编委会西北大学王宗维、周伟洲先生那边紧催词条，因此对词条打算马虎一点。每次当我打电话请教西南夷道问题时，他都解答得十分认真、谨慎，凡和我提出的材料相左的，他都一再说仅供参考。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问及他写的历史文物部分词条时，他都说：写得很慢，只写了三四十条。因为怕写出来不好会害读者，这是文德的事，不能马虎。他们要是再催，干脆就不写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不敢马虎了。听说后来他真的把西安那边警告了一番，也不管人家生气不生气。

像孙修身先生这样一批敦煌研究院的中年学者，当时都已驰名国内外学术界，但对后学却是很诚恳和随和的，丝毫没有现在的某些地方常有的门户之见，也没有什么架子。除了李正宇先生家，我也经常到他家去。他不大管家事，他太太也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家里也总是乱糟糟的。但他从来也不造作掩饰，扯过沙发上的东西扔到一边，让我坐下就聊起学问行的事情。碰到吃饭就吃饭，端起茶杯就喝茶。我不是敦煌研究院的人，但只要我请他帮助找一个材料，他马上就找给我。有时我自己动手到他书架上找书，他也从不见怪。他虽然在学术上很固执己见，但他从不贬低对方。我记得有一次和他谈到归义军张淮深的问题、沙州地志的问题，他坦率地说：“李正宇先生和我看法不一样。不过沙州地志他比我熟，你去问他。”问到敦煌遗书中占梦文书的含义，他又说：“这个我不在行，最好去问谭蝉雪先生，她研究这个。”他对后学真是一点都不轻慢、不见欺的善良。

想起这些往事来，历历在目，倍感孙先生友谊的真诚、可贵。主持孙修身先生纪念论文集的好友知道我与孙先生交谊之深，希望我呈一论文。但我思忖再三，觉得论文里无法表达怀念的感情，所以写了这样一篇心里的话倾吐思念，也好让不太了解孙修身先生的人知道他为学、为人的真诚和善良。

父亲的回忆

孙晓岗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神户大学文化研究科

我的父亲孙修身,1935年6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城关公社汪沟大队方靳寨村的农家。1955年8月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59年8月毕业后分配到西北民族学院(兰州)任教。1962年因受迫害而被转到甘肃省张掖地区临泽县水利局从事基层工作。1963年调敦煌文物研究所(现为敦煌研究院)从事石窟考古和佛教美术的研究工作,到逝世为止在敦煌工作了37年。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组(即今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的前身)组长。1982年任敦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1988年晋升副研究员,1993年任研究员。曾被聘任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的兼职教授,并担任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

父亲家境贫寒,却从小就有勤奋学习的精神。记得他曾经给我们讲过,由于村里没有小学,要背上千粮,到往返20公里的天王寺小学寄宿学习。大学时代家庭贫困,其学校费用、开支全部由咸阳的姑妈负担。毕业后虽然从事了短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但主要还是30余年间在敦煌那种极端艰苦条件下生活的,并为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及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贡献。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努力,重视收集敦煌学基础资料,知识丰富,学识渊博,被称为“敦煌的活辞典”,其研究范围包括历史、地理、考古、文献、民族、宗教、艺术、中外佛教关系等诸多学科。1979年以来,在国内外书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并出版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等,遗著《敦煌与丝绸之路交通研究》也将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父亲早年就注意到敦煌佛教艺术中佛教史迹画的价值,并全力投入此项研究,从其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对刘萨河史迹画的研究,在佛教学术界影响很大,被很多学者所引用。他注重史料与遗物的综合研究,记得当年他为了刘萨河史料的调查,坐着吉普车、骑着马到武威的山中进行实地考察,并做了详细的资料记录。这些长年积累研究的成果,由于出版费用的问题,至今没能出版而成为憾事。

关于佛教东传史迹画探讨,早已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课题,也是父亲数十年的研究课题之一,他的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敦煌与丝绸之路交通研究》等,都是这些年来研究结晶。

近数年,对于佛教经典中的《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的研究,他以敦煌藏经洞的写本为基础,与其他版本、金石铭文、各大石窟的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变画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讨佛教中国化的源流及变化,其成果引起了研究者注目。

敦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方,各民族对敦煌莫高窟的开凿有着直接关系。父亲选择了归义军后期政权与甘州回鹘及中原交通为目标,前后发表了《瓜州曹氏年表补正》、《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张淮深之死再议》、《谈与瓜州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的交通》、《敦煌遗书P.2992号卷〈瓜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

等论文,纠正了前人研究的误点,提出新的论据。这些都是敦煌历史、甘州回鹘史研究的代表作品。然而《甘州回鹘史》一书至今仍未如愿完成,他带着这个遗憾去了彼岸。

对佛教艺术的研究,父亲重视实地考察,以石窟图像资料、遗迹、遗物资料、史书、文献等资料,并进行综合研究,不断提出新观点,补证前人研究的不足,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其结果已引起同行的注目。1993年作为特别研究员被东京艺术大学聘任,并应邀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国际学术会议及讲座,其渊博的知识受到研究者的好评。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正直的一生、简朴的一生,治学谨慎,他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敦煌。在他去世周年之际,学术界同仁为纪念其学术业绩,并策励后学,共同发起并筹备出版了这一纪念文集。前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研究员、日本茨城大学教授文物保护专家茂木雅博先生在百忙中拨冗主编了该文集;还有父亲生前好友、同僚及诸先生、学生也都不辞辛劳提供上等的论文。在文集即将付梓之际,我谨代表我的家人向他们深致谢意。尤其是杨富学、马德二位博士对文集的出版工作出力尤多,在此一并深表感谢。感谢诸位为本书的出版、编辑而献出了宝贵时间,我相信我父亲在佛光普照的三危山下、静静的大泉河边,能够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一定会发出微笑。

2000年1月16日于日本神户

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简介

孙修身

编者按:本文为孙先生 1993 年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给学生作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今遵家属意于此刊发,以表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尽端,是甘肃省最西的一个县级市,也是古代中西交通陆上干道“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中西交通的门户,总制着中西交通的主干道。古时这里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文化活跃,中国文献记载其每天都有早、中、晚三市,同来自印度诸地的商客贩徒进行着频频的交易。《耆旧记》载其“村村相属,多有寺塔”,可见佛教和佛教艺术在敦煌发达的景状。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嗣后,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朝代的相继修凿,形成一座举世无双的艺术群体。后来虽经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到目前,在南北长 1618 公尺的崖面上,仍然为我们保存有各个时代的洞窟 492 个,在这些洞窟中为我们保存有壁画 45000 平方米,塑像 2400 余身,唐、宋时代所建筑的窟檐 5 座,是一部系统的佛教美术史,为研究佛教、佛教艺术、中西交通史、丝路文化史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备受人们的重视,被誉为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画廊,1963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又被联合国公布为世界重要的文化遗存。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P. 2551)碑文虽然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但是由乐傅、法良禅师始凿的洞窟已无可考,在现存的 492 窟中,人们公认南区洞窟中部二层现存的 268~275 窟一组是敦煌莫高窟最早的一组洞窟,其时代早至何时,现在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主北凉说者,亦有主北魏说者。

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兴起之因,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招来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的人主中原,他们纷纷建立政权,攻城掠地,争战不断,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处于死亡线上的人们,既无力改变现实,又想安稳地生存,因而,把希望寄之于神佛超自然力的拯救,于是开始开窟造像,出现了敦煌莫高窟等一系列的石窟群体,这就是目前所存在的苦难呻吟说。其次是着眼于敦煌的特殊地理位置,谓敦煌位在丝绸之路上,过往的人们都要在此居留,故敦煌较早接触佛教,并受其影响,在敦煌地区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五个庙、一个庙诸石窟群体。我在来日本前,曾经考察中国北方的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宁夏、陕西诸省区的石窟,发现这些石窟的出现,并不是在战争最为频繁的时代和地区出现,相反是在相对安定的时代和地区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比如河西另一有名的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出现于北凉时期的,有名的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出现于后秦时期,敦煌莫高窟出现于前秦建元时期,甘肃省的庆阳北石窟寺、泾川的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又是出现于北魏统一北方,迁都于洛阳,牢固地统有北方,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洛阳的龙门、巩县石窟亦然。在这个时期,虽有战争和灾难,但是相对来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社会相对地

安定下来,生产相对地发展起来,因而,我认为战争灾难的苦难呻吟说是不能说明石窟寺和佛教、佛教艺术发展的真正原因的。而以地理位置来说明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产生似是有道理的,但是,要说明有的石窟则是不通的。我认为石窟艺术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是因佛教自身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由印度阿育王弘教后,将其推向世界,使其成为更多人的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因而改变佛教的供养物,由原来崇拜佛陀使用的遗物、活动的遗迹、死时所留的遗迹而为偶像供养,这里要说的佛教中所讲的优填王造像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造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龙门、巩县、北响堂山都有实物的遗留。另外是,在五代时期的钱氏曾造像,散往各地,宋代日本僧人在求法和巡礼中国时,曾在五台山获此像和舍利塔带回日本,并广为流传就是证明。在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出现和广为信仰是有其过程的,始为统治者所限制,后被认可,但是,又为特有传统思想的知识层所反对,这主要是由于佛教的戒律和其一些经典宣传的内容所造成的,为了使自己能在新的地区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佛教徒从儒家学说中吸收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这种吸收改变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最终填平了和儒家学说间的鸿沟,出现了三教九流一家的趋势,福建出现的“三一教”是这种事例得以最后完成的标志,这样便出现了所谓的中国佛教。

由于佛教的中国化,儒释的合流,使许多人皈依于佛门,成为释迦的信徒。这些新人教者,目的各异,他们的皈依佛教,使佛教获得发展,壮大势力,消除中国知识层的敌意,对其本身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是求之不得的。凡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对其有利的同时,亦为佛教的生存带来了新的危机,不遵守戒律,这又使原有佛教的信徒,特别是较为保守的佛徒们大为震惊,他们惊呼“末法住世”,感受到危机的存在。为了使佛教能够永存和发展,他们在“末法住世”思想的支配下,采取诸多的手段来对付违戒僧尼,其中一条就是开窟、刊经,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多的,北齐时期的刊经遗迹已在河北省邯郸市被发现,在南北响堂山存在着刻佛经的石室。敦煌莫高窟由于自然条件的局限,无可供刻经之石,但有可供开窟的山崖,所以一些高僧大凿敦煌莫高窟,形成了敦煌莫高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由于大量违戒僧尼的存在,至北周武帝建德四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灭法运动,影响所及达到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区,如甘肃省永昌县的瑞像即毁于此劫。但是由于敦煌位于边远,周武帝又很快死去,其灭法似乎未及敦煌。

在周武帝去世之后,北周政权很快为隋文帝杨坚所取代,新朝改变其政策,在全国复法,其诏敕亦传到敦煌,在隋朝复法时期,高僧们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抓紧开窟造像,积极发展自己。根据统计,在现存的 492 窟中,有隋窟 96 窟,几占莫高窟现存洞窟的五分之一,如果和隋代存在的时间 30 余年相比,平均每年有三个洞窟出现,其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唐代,又在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此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儒释的合流,佛教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其主要是大量的石窟的私人 and 家族、社会集团的占有,其作用也偏离了供佛的目的,成为宣传统治者和世家大族威赫的场所,石窟亦由原来供人们祈愿纳福的公共活动场地,变成家庙和权势人物的私有物。敦煌莫高窟有许多洞窟都标有姓氏,如大家知道的 220 窟,即为敦煌大家翟氏所开,自唐贞观十六年开窟至宋代,曾经过晚唐、五代、宋多次的修变,修复者都是翟姓之人,如五代时期在敦煌归义军府衙的官僚翟奉达,特别是在甬道南所见的墨书铭文,更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它的私人占有,所以他可以用来转赠于人,这种性质,直至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所开 98 窟彻底完成,窟中的“大朝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即是窟主”的供养人画像和题名,证明了石窟的私人占有和世俗化、中国化的彻底完成,这也是隋、唐、五代时敦煌佛教艺术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敦煌佛教艺术是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宝库,探讨其源流的论文也相继出现,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说。其一是西来说,也主要是根据佛教的西来,敦煌的特殊位置等而立论的;其二是东来说,亦称为城市中心论,主要讲城市文化影响四裔而立论;其三是土生土长说,主要以其反映当地民族习俗和信仰而立论的。我认为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形成,当是以上三种因素的集合体,更多的是东方,即城市中心说,当地的影响亦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人们所讲的原因之外,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人们所持而立论的,即早期敦煌佛教艺术中所见的那种粗犷的笔触和画法,在最近佛爷庙湾发掘出来的晋

墓壁画中得到证实,即在敦煌莫高窟开窟之前,这种壁画艺术,在敦煌地区即已存在,特别和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四壁下方所见金刚力士等如出一辙的图像,还有题名、神话题材、墓室和洞窟形制相同,都作覆斗式型,为我们证明它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依据。而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或见于同期,或者早于其时,又证明其同中原之间的关系,故而我认为敦煌佛教艺术的源是和中原王朝的影响不无关系的,又从敦煌佛教艺术变化的规律和序列,一般都较中原为晚,故而考察其艺术的源和流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原文化对其巨大的影响。

敦煌早期的洞窟型制一般有两种,一是中心柱窟,这种形式早期最多,在印度称作支提窟(即讲堂),延至于初唐而绝迹;二是覆斗式,在印度称为毗诃罗窟,这种形式,同莫高窟共始终;其三为个别禅窟268一组和285窟等,是极少数。

早期洞窟中心柱四壁开龕造像,一般是四像或者是八相成道,在南北的侧壁,亦多有阙形龕,塑思维菩萨。壁画的内容,一般可以分为贤劫千佛、供养人、尊像图、花边图案、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中国神话传说故事,表现形式一般为单幅式,如275、241诸窟,一般采用异时同图的表现手法,将一个繁缛的故事,压缩在一个画面上表现清楚,如254窟的尸毗王本生、萨埵本生、降魔变等,亦有将其作为一个画面来表现的,如275窟北壁所见等经变是连环故事画,如257窟所见的鹿王本生、296窟微妙比丘尼、福田经变、善事入海、须阇提本生等,以山树等隔开故事情节,人大于山是其特点,如249等,开始出现了福田经变,表现有少数密宗经典的内容,如428卢舍那佛、285的外道,中国神有东王宫、西王母、伏羲、女娲等题材。

隋唐五代时期继前发展,窟形如前,有两重龕的火焰型背光,在此时出现了许多的小型经变,如维摩变、法华变等。唐代是大幅经变画、供养画像居统治地位,也是变化最多,最具社会性的绘画,还有许多的出行图,如张议潮、张淮深、宋国夫人,以及后来的曹议金、回鹘夫人出行图等。在此时出现有戒律方面的画面、佛教故事画等,将其表现的内容扩展至律和史诸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宣传合于儒家思想孝道的画面,表现出明显儒释相合趋势。

元代是敦煌莫高窟发展史的最后时期,亦是一个高峰,但是洞窟有限,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密教的东西,如3窟千手千眼观音,绘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画法,以曲铁盘丝和折芦描见长,465是藏传佛教内容,画有五智圆通、诸变形菩萨,绘画用白色,采用凹凸法,使我们可同时看到几个面,这是元代八思巴人河西弘教,带来新的画技影响的结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代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应当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元代灭亡之后,明朝封关,敦煌被置于关外,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发展也由此而终止。

敦煌佛教艺术是探讨日本佛教艺术的重要依据,在日本研究佛教艺术的先生们,常把敦煌佛教艺术作为日本佛教艺术的源头,足见其对于敦煌佛教艺术的重视。诚如前述,敦煌佛教艺术有许多是受中原影响的,比如佛陀的造型,特别是其中在北周时期出现的孩童式的形象,这在南北响堂山之东魏、北齐洞窟中,乃至更早,即已出现,再如秀骨清像的画、塑,据中国画史的记载,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然后经过中原、麦积山等地传到敦煌,但仅是昙花一现,闪而即失,仅见于285窟东壁。再如菩萨身上出现的繁杂的饰物,这在东魏、北齐的响堂山早有所见,而在敦煌则出现于隋代,经变画的出现在安阳小南海的魏窟中已有所见,巩县的魏窟亦同,在敦煌则始见于隋代,所有这些都证明敦煌佛教艺术是受中原影响的。这种形式亦影响到了日本,故而一些日本的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源于敦煌的,我认为说源于敦煌不如说是源于中国中原更好。

在日本法隆寺佛塔下看到的涅槃图,有的先生将其和敦煌295窟作对比,认为源于敦煌。敦煌是有这种表现形式,但在中原出现的时间更早,如敦煌所见的新样文殊和文殊化老人故事等,在敦煌是现实存在的,但是两个故事是单独表现的,而日本有文殊三尊像和敦煌所见相近,而五尊像却无,相反在山西五台山则有之,较日本的早将近50年。日本文献记载,确有日本僧人入五台山巡礼,而他们由五台山得此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一题材在两国的存在和相近的表现情况,为我们的上述看法作了最好的说

明。此外,有许多绘画的形式、经变的表现方法,都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日本的佛教艺术的源头应在大陆的中原地区。

我们在考察一些寺院时还看到有些雕像接近于中原北魏时期,特别那衣纹皱叠,下面作云头状的雕法,更是如出一辙,但是时代晚得多。

总之,根据本人所接触的资料,我认为法隆寺受中国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照搬和摹拟。但是,也并非就毫无改变,只是改变不大。日本的僧徒生活,亦和中国相近,中国的僧徒已加强了和社会的联系,日本僧人干脆置身于世俗,这是对中国佛教的一大发展。

冈仓天心与华尔纳

茂木雅博

日本茨城大学人文学部

一 前言

1923年被兰登·华尔纳所剥落的敦煌唐代壁画的痕迹,莫高窟至今仍残存着,使人深感痛心,惨不忍睹。被他剥取带走的壁画现在收藏在哈佛大学附属博物馆。敦煌莫高窟在殖民地战争时代,成为欧美及日本、俄国所谓探险队、文物收集队所猎取的对象,现今所知就有12个国家分散收藏有敦煌的资料。其中以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奥登堡、华尔纳等带走的最为有名,因而成为20世纪博物馆、美术馆中最引人注目的资料。

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破坏中国的文物和盗取文物痕迹,在今日很多遗迹中还可以看到。最容易使我们想起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河南省龙门石窟。这两座遗迹的壁画被割取,石佛像被凿取,这就是现代文明国家侵略中国文物的表现。为了对21世纪的和平付诸行动,我个人期待着这些被盗取和掠夺的文物能够早日归还到原来的位置和场所。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实现此目的,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搞清楚文物收集的过程。本稿拟从华尔纳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动行为,还有他在日本留学的那段经历,以及他与冈仓天心的关系述起,对现代国家博物馆建设的意义进行一点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导。

二 冈仓天心与博物馆

华尔纳在敦煌掠夺文物的行为,起源于他到日本留学为背景的,而他从师于冈仓天心为一个主要原因^①。在这里我想从冈仓天心的时代开始,首先谈谈日本近代国家的建设和文物保护的问题。

根据冈仓天心的年谱可知,他1862年出生于横浜,是冈仓觉右卫门的次子。觉右卫门以前是福井藩的下级武士,1855年晋升为“江户詰”,福井藩为了贮备资金,在横浜开设了商馆“石川屋”时成为店员而移居横浜。父亲觉右卫门具有经商的才能,后来被选为该店的负责人。这是1862年2月的事,所以说天心出生时,与其说冈仓家是武家,倒不如说,作为“商家”而受到福井藩的青睐更合适^②。

■ 冈仓天心的年谱

天心1869年3月(8岁)开始,就学James Ballabh私学堂学习英语,接着二年后,在开设的“英语熟高岛学校”入学进行正规的英语教育,1873年由于福井藩“石川屋”闭店的命令,移居东京的福井藩下屋敷,同年入学“东京外国语学校”,1875年作为“东京开成学校”的奖学生入学,1877年4月“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改名“东京大学”,天心转入文学部,受当时雇用的外国人讲师Ernest Fenollosa的指导,学习政治学、理财学、哲学等。1880年7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虽然完成毕业论文《国家